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系统科学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编号：Xq13A02）

SICHUANDAXUE JINGJIXUE SHANGXUE JIAOYU YU YANJIU
(1902-1949) : DANGAN YU QIKAN XUANBIAN

四川大学经济学、商学教育与研究

(1902—1949):

档案与期刊选编

王东杰 徐悦超 /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运动（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

徐悦超，吉林长春人，2009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现为四川大学中国史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经济学、商学教育与研究

(1902—1949):

档案与期刊选编

ISBN 978-7-5690-1546-1



定价: 96.00元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系统科学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编号：Xq13A02）

1902 1903 1906 1907 1910 1923 1924 1928 1930 1934 1935 1938 1940 1943 1944 1945 1946 1949

1912 1913 1915 1916 1919 1921 1922 1927 1931 1932 1933 1936 1937 1939 1941 1942 1947 1948

四川大学经济学、商学教育与研究

(1902—1949):

档案与期刊选编

王东杰 徐悦超 /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大学经济学、商学教育与研究:1902—1949:
档案与期刊选编 / 王东杰,徐悦超编. —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90-1546-1

I. ①四… II. ①王… ②徐… III. ①四川大学—经
济学—教育史—研究—1902—1949 IV. ①F-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9774 号

书名 四川大学经济学、商学教育与研究 (1902—1949): 档案与期刊选编

著 者 王东杰 徐悦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546-1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插 页 6
印 张 17
字 数 45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8409/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导 言

晚清以来，西力东渐，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开始了全面转型。商业活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大体来说，这方面出现了三个新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在 20 世纪之前，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发达，与西欧相较，恐怕也不遑多让，而时人对商业的评价也大为提升，黄宗羲甚至有工商亦为国本之论。^①然而这些看法并未从结构上颠覆旧的经济价值系统，充其量乃是把工商提到与农业同等重要的水平。但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由于中西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商业的重要性也极大地得到彰显。1862 年，曾国藩提出“商战”一词，并迅速风靡，成为晚清思想中最为活跃的概念之一。^②这样一来，商业乃成为关系天下安危的军国大业，其排名也逐渐提升到农业之前（具体也有很多曲折，惟与本文主题无关，不及详论），与此前的论述已大有不同。

第二个现象与此相连，那就是商人社会地位和自身使命感的增强，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类社会事业和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并对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③

第三个现象，即是本书的主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商业领域开始出现正式的专业性学问体系——“商学”。自然，对于商业活动和经商技术进行记录与思考的著作，在中国早已出现，但是，它们大体上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更不能说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商学，“是把新型商业活动在知识上的积累组织起来成为专业知识，作为培养新型企业人才的助力”。它的产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工商业有别于传统做生意，需要一套不同的专业知识作为工具”。叶文心教授曾经指出，商学乃是中国现代工商业活动的三根基本支柱之一，它和商法、商会一起，“共同建构了民国以来新式企业运作的制度基础”。^④不过，相较于前两个问

① 有关言论，大略可参考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2006 年，第 91～95 页。

②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98～322 页。

③ 关于商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对公共事业和政治活动的参与，研究著作甚多，较早的比如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 年。近年来，冯筱才教授提出 20 世纪中国的“政商”现象，值得注意。见其《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④ 叶文心：《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04～105 页。

题，这方面的既存研究也是最为薄弱的。^① 因此，了解晚清以来商学知识的研究和传播情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

本书是一部以 1902—1949 年间四川大学经济学、商学研究和教育发展状况为主题的史料集，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川大档案馆藏有关校史档案；二是川大校刊（主要是 1932 年 9 月创办的《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39 年 6 月起，该刊改名为“国立四川大学校刊”）；三是川大所创办的经济学、商学期刊。我们编辑这部资料集，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中国近代商学史的研究人员提供一点史料；二是对川大经济学、商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回顾。由于川大在历史上几经分合，沿革比较复杂，本书尽量包含了其前身各个学校的情况（为了表述方便起见，后文有时会将这些学校统称“川大”）。此外要说明的是，今天的川大商学院是 2012 年由原工商管理学院更名而来的，在此之前，川大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但这不等于川大历史上不存在商学研究和教育，不过，其相关学术职能主要是由经济学科来承担的。事实上，即使只从学理来说，我们也很难完全将商学和经济学割裂开来。因此，本书把这两个学科的资料放在一起。

下面，我们简单勾勒出一条川大经济学、商学学科（包括研究与教育）发展的线索，以为读者理解书中的有关史料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

整体来看，1949 年之前，经济学、商学学科在川大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清末新政时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是学科的萌芽阶段；第二个时期从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中期，是学科的起步阶段；第三个时期是 30 年代中期以后，是学科的飞速发展阶段。

一

如上所述，商学是典型的“西学”。它在中国的出现，是近代教育和学术转型的结果。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晚清士人虽然很早就意识到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这并未立刻引起人们对商学的重视。事实上，它在最初的西学“课表”上所占据的地位，远远不能和数学、舆地、矿物以及声光电话诸学相比。在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更是如此。

今天的四川大学，可以追溯到 1896 年成立的中西学堂。这个学堂是为了培养“博通时务”的人才而设立的，其中的西学课程，主要是英文、法文、舆地、测算、各国史策等^②，并无工商方面的课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898 年 8 月 12 日），时值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旨开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分途取士”。时四川督学“按试各属”，却发现“各属诸生通晓时事、贯彻中西之学者，尚属寥寥”。为此，令各府厅州县将当地各书院“官师月课一律改课时务策论”，而

^① 笔者见到的似乎只有一部许康主编的《百年名校 商学弦歌——湖南大学商学 100 年》，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② 《四川中西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鹿传霖审订，见党跃武主编：《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1 页。

不再试以“时文试帖”。其中便明言，策论范围包括“商务”。^①但细读此通札文，其所提及的主要是天算舆地、泰西语文，有关商务内容只是一掠而过。

不过，进入20世纪，这一现象有了显著改变。1902年，时任四川总督良俊将成都原有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中西学堂等合并起来，成立了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从现存档案看，高等学堂设置有经济类的教习。^②1908年，高等学堂设立正科（本科），专业分为三类，其中文科类设有“理财学”课程。^③曾为清末四川咨议局议员的陈崇基（日本法政学堂毕业）担任本课教员，以《李译经济学》为教科书。^④该课讲授的内容，今日已很难看到，但我们不妨从几份试题中窥豹一斑。其中如宣统元年第二学期（1910年6月26日）的一份考题：“论议会与国家财政之关系”。^⑤宣统二年第二学期（1911年8月29日）几份试题：“（一）国家经费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减，其理由如何？（二）何谓‘特别会计’？”“（一）不增加生产费而能增加数量之财货盍？举例以说明之。（二）何谓‘跛行本位制’？”^⑥

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也会涉及与经济学、商学相关的内容。比如，1904年6月19日外国政治地理课的试题中就有一道：“与俄国通商之国，以何国为最？且中国运往之货物如何？”而另外一份试题也问道：“五口通商始自何时？陆路通商有几？何地通行？航路者有若干？公司以何公司最占优胜？”^⑦1908年5月份的中国地理试题中，有好几道与经济、商务有关的题目，既涉及历史，也涉及当代；既涉及对外贸易，也涉及国内贸易。^⑧这里只是略举几例，类似的试题还可在本书内找到。从这些试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外商务是高等学堂各科重视的一个重点，这显然是和“商战”思想分不开的。

经济学、商学知识传播的另一条渠道是图书。本书收入了几份高等学堂的图书目录。从中可以看到，政治法律学部、理财学部、外国文科学部、杂著部等都有相关图书。^⑨而在一份书籍清册中，仅理财学部的图书就有58种，117册，包括中、日、法三

① 四川洋务局：“给各学堂讲求时务的命令及中西学堂的通告”（1898年8月12日），四川大学档案馆藏“中学堂档案”，第2卷。

② 1905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吉田义静应聘法制经济教习，正月到堂，四月辞职。见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本堂总理教员监学委员姓名年贯表”（1908年3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87卷。从档案来看，高等学堂的优级师范科学生课表中有“法制经济”一门，不知吉田教习是否担任此门。见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全级每周课程时间表册”（1908年3月），第87卷。

③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④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本堂一类三班、二类二班采用图书及编辑讲义一览表”（无具体时间），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87卷。

⑤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宣统元年第二学期考试各科题目清册”（1910年6月26日），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59卷。

⑥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宣统二年第二学期考试各科题目清册”（1911年8月29日），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60卷。

⑦ 两份试题均见四川高等学堂：“为开办实业学堂请学务处转总督部堂的报告”（1904年10月1日），“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6卷。

⑧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第四年第一学期考试学生各科题目清册”（1907年7月19日），“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55卷。

⑨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本堂新学各图书目表册”（1905年9月21日），“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185卷。

种文字。^①

1904年10月，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胡峻（1867—1909）还根据学部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呈请总督，开办实业学堂。呈文认为：

川省地大物博，号为陆海。发其山泽之藏，濬其人民之智，宜足抵制外来，角巧欧美。乃农事则拙于力，工艺则拘于墟，商务则有输入而无输出。千金盈橐，大盗覬觎。目前外人之争商埠、争藏卫者，所争以此；外人之要铁路、要矿权者，所争以此。为今之计，欲亟筹抵制之术，则惟有赶兴实业学堂之一法。实业发达，其益有三：无游民也，消隐患也，免利权也。蜀中据扬子江上游，轮廓五千里，生齿七千万，我不自治，人将生心，迩来现象，危机已露。

显然，胡氏此议，同样是在与西人“商战”的意识下展开的，同时也有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呈文中还提到：地方上已经办理的实业学堂，“又专盼省城之升补”。^②可见他是把实业学堂视为与高等学堂同一级别的学堂。据云，为了开办实业学堂，胡峻还专门从高等学堂普通科中选派了12名川籍学生赴日本学习，以培训师资。^③不过，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是何关系，从呈文中无法明确看出。

除了高等学堂之外，四川在清末新政中还设立了几所专门学堂。其中，1905年成立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开设了“经济法制”课，教习为黄赞元（字镜人，候选县丞，入民国后曾为国会议员）。^④1906年8月成立的四川法政学堂开设有“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⑤1916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在几经周折后，定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成都高师”）。由于四川高等学堂在同一年正式停办，成都高师遂一跃成为川中最高学府。尽管作为一所师范院校，其主要使命是培养中学师资，但仍然开设了“经济学”课程。^⑥

事实上，这一时期四川经济学、商学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个学校是1916年经四川法政学堂改名而成。学校设有预科，以及法律、政治、经济三个本科。这也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本科，其课程包括经济史、货币论、银行论、财政学、财政史、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簿记学、商法、统计学、保

①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清理前四川高等学堂书籍书目清册”（无具体时间），“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190卷。

②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为开办实业学堂请学务处转总督部堂的报告”（1904年10月1日），“四川高等学堂档案”，第6卷。

③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④ 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教员姓名底册”（1909年4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档案，第3卷。按黄氏后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⑤ 1910年的材料显示，经济学、财政学教师为周择，商法教师为周常昭（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第25页）。按周择为留日学生（参见刘静：《留日人员与清末法制改革》，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周常昭也是留日学生，曾任四川咨议局议员（参见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⑥ 每周两学时。教师洪楷，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一览表”（1921年12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档案”，第40卷。

险学、交易市场论、仓库税关论等。另外，法律本科、政治本科都有商法，预科亦开设经济原理一课。有关教员包括李辟（货币论、经济学）、陈崇基（商法）、盛宗培（公司条例）、罗学洙（商法）、沈翰（公司条例）等人。^① 仅就课程表来看，比起法政学堂时代，学校在经济学、商学方面的力量扩充了不少。1922年2月，学校还计划设置政治、政治经济与经济三个研究科。其中，政治研究科的科目除了宪法、政治学等外，还有财政学；经济研究科的科目有经济学原理、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和簿记学；政治经济研究科的科目包括宪法、政治学、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② 不过，由于材料缺乏，目前我们尚无法知道研究科的性质、具体设想——事实上，这个计划大概最终只保留在纸面上。

大体来看，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川大的经济学、商学还只能说是处于萌芽阶段，学科在整个学制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直到法政专门学校时期才设立专门的经济学专业），活动以教学为主，根本谈不上研究。有关的教员多有留日背景（高等学堂还曾聘有日本教习），但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其学术水平难以悬断，但揆之常理，恐怕不会太高。

二

中国20世纪经济学、商学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推进连在一起的，四川尤其如此。从上面的描述来看，有两类学校是这类知识生长的温室，一个是综合性院校（如四川高等学堂），一个是政法类的专业院校（如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后者是因为其时经济学、商学学科常常被放在法学专业下的缘故。由于高等学堂停办后，川中一直没有一所综合性院校，因此，在经济学、商学人才培养方面，长期以来是法政专门学校一枝独秀。直到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成立后，才打破这一局面。

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一向思想开明，自其办学之初，就设立了经济系，并在1926年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按照《组织大纲》，经济学系属于法科（1930年改为法学院），该科（院）还有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格局基本与法政专门学校相同。其中，经济学系的课程由必修和选修科目组成。必修科目包括经济学、统计学、西洋经济史、民法、外国语经济学选读、宪法、会计学、保险学、货币及银行论、国际金融论、簿记学、农业政策及商业政策、商法、经济学史、财政学、社会主义之理论及其系统、交通政策及殖民政策。选修科目包括社会学、哲学、经济地理、政治学、刑法、行政法要论、国际公法要论、交易所论、市政论、中国经济史、中国财政史、劳动法及工场管理

^①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9、40页。此外，从档案中看，有关课程还包括英文经济原理、预算论、破产法、公债论等。见校长颜【编者按：颜楷】：“关于经济本科别科已二班学生毕业试验科学日期表的牌示”（1916年5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公立四川法政学校档案”，第6卷；校长颜：“关于派员选试四川公立法校经济本科、别已二班毕业试验的呈”（1916年5月），“公立四川法政学校档案”，第6卷。

^② 四川法政学校：“呈请备查本校拟设研究科规程的文及细则”（1922年2月22日），“公立四川法政学校档案”，第6卷。

等。同时，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也都有经济学类的课程。^①

比起此前各校，尤其是政法专门学校，成都大学经济学系的专业课程并没有太大的增加，但却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培养学生较为宽阔的知识基础，特别注意跨学科的视野：除了同属法科的政治学、法学类课程，还包括社会学、哲学科目。二是特别突出经济学作为一门“西学”的性质：“西洋经济史”乃是必修课，而“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财政史”都是选修课程；“外国语经济学选读”一课要讲授两个学期，这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原汁原味”的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学生的外语水平。三是受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其选修科目中有“社会主义之理论及其系统”一门，而系主任张籍本人也深受马克思【恩】主义的影响，著有《马克思主义概观》等论文。^②在课堂上，他根据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的著述，讲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③毕业于该系的王宜昌在后来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成为“中国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自称其思想来自于马克思主义^④，显然是渊源有自。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校长张澜的倡导分不开。张澜曾在成都大学经济学会（详见后文）成立大会上，公开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只能给我们一些经济常识，零碎的经济说明，并不能给我们以整个的生产法则、生产组织的系统知识。”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恰恰与这个相反”。^⑤

从师资来看，根据1929年的资料，国立成都大学经济系有三位教授，一位讲师：张籍（字与九，以字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士，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员；沈月书，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商学士；王恩藩，美国士丹福大学文学士、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硕士；讲师周燮元，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硕士。^⑥从学术史上看，这几位的成就也不是很大，不过他们至少都得到过正式的经济学、商学学位，代表着专业程度的提升。

国立成都大学经济学系的另一个突破是对研究风气的提倡。这是和张澜以学术和思想自由为治校方针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1929年4月，经济系学生组织了“经济学会”，并出版了《经济科学》杂志。该刊以“持客观态度，用科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理，分析经济现象，及介绍一切经济学说”为宗旨^⑦，本拟为季刊，但实际上只在1929年出版两期，就无疾而终。不过，这是四川的第一份经济学专业杂志，其象征意义不可低估。

该刊第1期发表了张澜的《怎样研究经济学》，就是他在“经济学会”成立会上的演说辞。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张氏的办学思想。他在演说中提倡学生的“自动”研究风气，把经济学会的成立看作学生“求高深学问的开始”。这表明他不同意此前经济学、商学仅以单纯的教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力图把这一学科提升到“高深学问”的层次。至

① “国立成都大学一览”（1929年9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成都大学档案”，第1卷。

② 张与九：《马克思主义概观》，《经济科学》第1期，1929年；《马克思主义概观（续）》，《经济科学》第2期，1929年。

③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④ 吴敏超：《“中国经济派”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⑤ 张澜：《怎样研究经济学》，《经济科学》第1期，1929年。

⑥ 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一览”（1929年9月），“国立成都大学档案”，第1卷。

⑦ 《编辑略例》，《经济科学》第1期，1929年。

于具体方面，张氏提出两大研究方向：“第一是经济学的理论；第二是经济学的实际”。在理论方面，提出经济学说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而号召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实际方面，要求学生去研究“当前世界经济现象和中国经济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最后提出：

若是像这样去研究，对于这些问题都了解，那末，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学，才是活的，真的，实在的，且非常合用。同时，我们还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最显著而激烈的时代，差不多像到短兵相接的阵势了。我们只有明白上面所说那些问题，才能够理解它们的曲直是非，世界情形，而决定我们自己的态度和中国的未来，使将来能够在一个光明大道上走，不致误入歧途或没有进步。倘若对于经济真理不完全知道，对于实际不懂，那就是把经济学古董化了。那种经济学者，只可说是一个经济学的考古家罢了，或者还简直配不上说经济学者咧！^①

显然，张澜特别注重学术的经世致用功能，这正是他倡导学生去研究“经济学的实际”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理论方面，他之所以注重社会主义学说，也与此密切相关，并不完全是纯理论的兴趣。

从《经济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张澜的办学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刊物上的作者既有教师（张与九、沈月书等），也有学生（其中以王宜昌最为活跃，除了本名外，他还使用“凌空”的笔名在上面发表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生自动研究”的精神。就内容来看，第1期较为注重理论性的探讨，但也有《关于中国土地分配的统计》（凌空著）、《外国汇兑价格变动的观察》（周子龙著）等贴近实际的文章；第2期同样以理论文章为主，但是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明显增加，包括《中国的失业者》（全良著）、《成都市的人力车夫》（松云著）、《成都市物价指数表》（王宜昌著）、《读了〈解决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着眼点〉以后》（何正明著）等。

1927年，成都市的五所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公立四川大学，其中包括法政专门学校——更名为四川大学法政学院，仍设法律、政治、经济三科，后改科为系。到了1930年，又将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合并为政治经济系。^②从二系合并前的课表来看，经济学系设25门课程，其中专业课有经济史、货币论、银行论、财政学、财政史、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交通政策、殖民政策、统计学、保险学、簿记学、商法、商业史、商业地理、交易市场论、仓库及关税论，另外还有宪法、行政法、民法概论、刑法概论、政治学、国际公法及外国语。^③显然，这些课程设计依然秉持了此前法政专门学校的格局。不过，整体来看，公立四川大学的经济学科并无突出表现，与国立成都大学相比远远不如。

① 张澜：《怎样研究经济学》，《经济科学》第1期，1929年。

②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46页。

③ 公立四川大学：“公立四川大学规程”，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公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卷。

1931年11月,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27年由成都高师升格而成)、国立成都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成国立四川大学,下设文、理、法等学院,在法学院中设立了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张籍为系主任),延续了此前各校的格局。

这一时期,经济学系在师资方面有了进一步改善,这可以从《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的有关报道中看出:黄永川(日本商科大学商学士,曾任安徽大学教授)、孔庆宗(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比利时京都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京师地方检查厅书记官,中国驻新义州领事馆及驻丹麦公使馆主事,中国驻比公使随员兼副领事等)、翟士煊(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陈绍武(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等。^①另外,如承担簿记学、统计学、经济地理课的黎学澄,承担财政学、货币、银行等科的陈觉民,承担票据法、公司法、民法债编的裘千昌(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科,曾任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主治民商法学),承担会计、簿记、统计等科的邵毓麟(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治学学士,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日俄科科长,中国驻横滨总领事,外交部情报司司长,中国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等)等^②,都是新聘教授。此外,从《国立四川大学周刊》发表的图书馆新进图书目录(第1卷第5~8期,第1卷第15期,第3卷第11~12期)来看,经济学、商学类的书籍也较前大有增加。

在学生社团方面,1932年6月,经济系学生发起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中国经济研究学会”,“以研究中国经济为宗旨”。成立之初,学会非常活跃,尤其注重对国内经济情况的调查。7月份,该学会向学校提出,上海为中国经济重心所在,但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使得当地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了解“上海经济之实在现象及目前之恢复方针、将来发展之计划;更以此为根据,然后分查各省之经济状况,以定全国经济之政策,用备当道之采纳”,该学会自筹经费,组织了一个“国立四川大学战后经济调查团”,拟于暑假中前往上海进行实地调查”之后,又先后前往兵工厂、财政部成都造币分厂进行实地考察。^③不过,自1934年之后,该学会就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了。

国立四川大学的成立,终结了此前成都一地“三大”鼎立的格局,有利于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川大正式迈入国内学术界一线阵容的开端,无论是在四川高等教育史上还是在川大的校史上,这都是一个重大转折。不过,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此一时期四

① 《新聘教授略历》,《国立四川大学周刊》(以下简称《周刊》),第1卷第2期,1932年;《新聘教授略历》,《周刊》第1卷第3期,1932年;《本大学增聘教员》,《周刊》,第1卷第14期,1933年;《本期新聘教授多人》,《周刊》第3卷第2期,1934年。

② 《本期新聘教员担任科目》,《周刊》,第2卷第7期,1933年;《新教授陈觉民抵省》,《周刊》第2卷第25期,1934年;《本期新聘教授担任课程科目》,《周刊》第3卷第12期,1934年。关于裘千昌的情况,参见《本校教授题名录:裘千昌》,《周刊》,第15卷第4期,1943年;关于邵毓麟的情况,参看石源华:《邵毓麟:民国首任驻韩大使》,《世界知识》2008年第22期。

③ 均在国立四川大学:“李思道等呈请成立四川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会简章等及联系去工厂参观的来往文件”(1932年6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553卷。

川地方政治环境的影响，国立四川大学成立初期（1931—1934年）的发展条件并不理想。^①校方虽筚路蓝缕，尽力维持，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整体来看，学术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事实上，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经济学、商学等学科的活跃程度甚至还不能跟成大时期相比。

三

1935年，四川大学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当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拉开了四川“地方中央化”的序幕。8月6日，行政院任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为四川大学校长。任氏是那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胡适、翁文灏等人关系极佳，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在四川大学校长任上，提出“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治校方案，使四川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跨入国内前列。1937年，任鸿隽辞去校长职务，不过，这两大方针仍为其诸多后继者们（张颐、程天放、黄季陆）所接受。而到了40年代，四川大学已经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整个学校的改变无疑会对其内部的各个学科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四川大学的经济学、商学的确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下面，我们试着从科系设置、师资阵容、课程安排、科研活动等几个方面对此略做一番考察。

（一）科系设置

1935年5月，教育部向四川大学派出视察专员。8月，根据视察报告，对四川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涉及科系设置部分，认为法学院中政治、经济两系“班次未齐，原有班次学生人数过少”，要求合并为政治经济系。^②不过，仅仅经过两年，到了1937年9月，教育部就批准再次恢复政治系、经济系的建置。^③从中不难看出这两个系迅速发展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大批学术专家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如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1939年9月，教育部鉴于“抗战以来，农、工、商、医等学科专门人才需要甚切”，而1939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中，投考工科和经济学系的学生人数增加，“为应社会需要，预储人才起见”，令四川大学增设经济学系一年级一班。^④这虽然是非常时期的举措，但仍然可以看作教育部对四川大学经济学系的再次肯定。

到了1942年，经济系学生已达近300人，成为全校最大的一个系。^⑤1943年10月，校方鉴于该系学生“逐年剧增，有加无已”，以致“人数众多”，向教育部提出，分

① 有关情况可参考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08～127页。

② 教育部：《令知视察报告要点仰切实改进具报由》，“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卷。

③ 代理校长张颐布告（1937年9月21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9卷。

④ 教育部：“令增设经济系一班”（1939年9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8卷。

⑤ 启元：《国立四川大学经济系教学概况》，《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2月。

设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会计及金融财政四组，然未能通过。^① 11月，四川省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发展实业必须培养工商业人才，而“成都市大学虽有多所，尚无工商学院”，故而恳请政府在四川大学开办工商学院，并愿筹助开办费五百万元。四川大学受此激励，不顾前次申请被驳回，反而扩而大之，计划于次年开办工学院及商学院，其中商学院设置银行、会计、工商管理、商学等学系。^② 但仍未得到批准。显然，至少从教育部的角度看，此一时期四川大学的商学研究尚未达到能够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水平。不过，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其人数逐年递增，规模也越来越大。1946年，经济系学生总数已达446人，不但是四川大学的“大系”，在全国的经济系中也“首屈一指”。^③ 到了1947年，更增至547人。^④

在经济学系之外，40年代，四川大学还有两个经济学、商学的教科机构。一个是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该系的前身是1938年在农学院中设立的“农业经济组”和“农业经济研究室”，其时有教职员4人（其中教授2人，助理员及练习生各1人），课程包括农业金融、农产运销、农村合作等。其后教职员人数和课程都逐步扩大。1942年，农业经济组升格为系。有专任教授3人，特约教授4人，助教2人。开设专业课程十余门，包括经济学及农业经济、农业金融、农村合作、农产价格、农业统计、农业政策、会计学、农场管理、农村社会学、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土地经济系、农产贸易等。^⑤

1944年2月，为了满足公教人员进修的需求，四川大学创办了夜校，其中设置了一年制的商学科，开设专业课程有经济学、会计学、商业史、商法、货币银行学、统计学、财政学、经济地理、商用数学、商品学、市场学、国际贸易、高等会计学，也包括一部分法学课程。^⑥ 在正式教育中一直没有得到批准设置的商科，通过夜校的方式实现了。

（二）师资阵容

自任鸿隽长校后，就将“妙选教授”当作“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措施。以其长校一年后的1936年为例，经济学方向的教师就包括黄宪章（法国巴黎大学毕业，专攻经济学和财政学）、陈绍武（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政治经济系研究院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员会委员，上海法政大学教授）、杨琦（字佑之，以字行。北京大学商学士，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商学院教授，后任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华西大学经济系和成华大学会计系主任。解放后任四川财经学院

① 国立四川大学：“为拟将经济学系分为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及会计组及金融财政组四组教学呈照鉴核令遵由”（1943年10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0卷；国立四川大学：“教育部指令经济系分组未便照准并达查照”（1943年11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0卷。

② 国立四川大学：“四川省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恳请政府在川大应开办工商学院以造就工商业人才。附原案一份”（1943年11月）；国立四川大学：“呈请开办工学院及商学院仰恳鉴核令由”（1943年12月），均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0卷。

③ 《经济学系现况报导》，《国立四川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校刊》），第18卷第3期，1946年。

④ 《经济系概况》，《校刊》，第20卷第2/3期，1947年。

⑤ 《农业经济系创始纪》，《校刊》，第15卷第5/6期，1943年。

⑥ “国立四川大学夜校商学组五年课程一览表”（1944年），“国立四川大学档案”，档案号：2068—1。

会计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系主任)、李崇伸(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文(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美国本雪尔斐宜亚大学硕士,曾任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商设计委员)。^①其中,黄宪章、杨佑之在之后均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而他们都是由任鸿隽聘请来的。

抗战期间,大批高校和学者内迁,也为四川大学提高师资水平创造了优越的条件。1937年9月,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补助四川大学7位讲座教授,其中经济学教授为赵人俊(字守愚,哈佛大学博士,原任国立清华大学教授,讲授高级统计学和高级货币学)。^②1938年,又聘到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王绍成为经济学教授。^③1942年,经济系有专任教授7人,庚款合聘教授1人(赵人俊),兼任教授3人,助教2人。^④1945年的规模略有压缩,但也差不多,拥有7位专职教授:彭迪先(兼系主任。1926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留任助教。1938年回国,历任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建四川财经学院,后任四川大学校长。著有《世界经济史纲》《货币信用论大纲》等)、刘泽膏(晚年曾任西北大学会计系主任)、张先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毕业,曾任广西大学教授、总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教务长,桂林市副市长等职务。著有《广西经济地理》《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等)、周伯棣(毕业于日本大阪商科大学银行系。曾任中华书局经济编审,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银行系主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兼财政金融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著有《租税论》《中国货币史纲》《国际经济概论》《经济学纲要》《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思想史》等)、胡寄聪(后任之江大学贸易系主任)、陶大镛(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曾任中山大学讲师、广西大学和交通大学副教授等。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赵人俊。此外,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有3位教授:刘运筹(兼系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理学士,曾在德国柏林农业大学从事研究,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兼设计委员会委员,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经济学系教授,国民政府农林部首席参事)、曹茂良、朱剑农(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曾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曾任国立商学院、安徽大学、湖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财经学院院长,湖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著有《自耕农扶植问题》《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研究》

①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6年版),第14~15页。关于黄宪章,参看徐舟:《父亲——徐特立外孙女80岁的心灵反思》,《党史纵横》2004年第7期;关于李崇伸,参看《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中英庚款董事会聘送本校教授七人》,《周刊》,第6卷第10期,1937年。关于赵人俊,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有生动回忆,参看其《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202页。

③ 《本校新教授纷纷莅校》,《周刊》,第7卷第1期,1938年。

④ 启元:《国立四川大学经济系教学概况》,《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2月。